

國學

第二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主辦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學·第二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四川省人民政府
文史研究館主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220—09308—1

I. ①國… II. ①四…②四… III. ①國學—文集
IV. ①Z126. 27—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79333 號

GUOXUE

國 學（第二集）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主辦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責任編輯	謝 雪
封面設計	張迪茗
技術設計	戴雨虹
責任校對	藍 海
責任印製	孔凌凌
出版發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樹街2號）
網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發行部業務電話	（028）86259624 86259453
防盜版舉報電話	（028）86259624
照 排	四川勝翔數碼印務設計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華龍印務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插 頁	2
印 張	38
字 數	6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數	1300 冊
書 號	ISBN 978—7—220—09308—1
定 價	76.00 圓

■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本書若出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我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電話：（028）86259453

目 錄

素王改制：廖季平先生經學思想的核心	蒙 默 (001)
.....	
先秦儒家政治哲學思想的基本特點	李蜀人 (032)
論南宋以來之治道與理學思想	謝桃坊 (063)
《詩經》的內容及其由來	向 熹 (090)
《詩三百》演化軌跡初探	林東海 (111)
儒家文質之辨	栗振風 (133)
封人與封人文化——中國文化起源初探	江玉祥 (138)
北周文王碑考釋	胡開全 (158)
敦煌文獻《生天因緣變》的創作和文學研究	張芷萱 (169)
佛典中大目犍連原型考	羅皓月 (183)
樊宗師考論	王定璋 (203)
楊繪行年考	柯貞金 (216)
呂惠卿經營西北史實考	湯 君 (235)
陸游著作三種版本考述	王永波 (273)
朱子學是安身立命之學	高令印 (291)
劉辰翁評點杜甫詩輯錄	焦印亭 (315)
見存清詩話續錄	蔣 寅 (344)
清代臺灣南部地區詩人詩作引述《詩經》探論	楊晉龍 (382)
清代宮廷的蒙古音樂與乾隆皇帝的蒙古樂詩	范子燁 (405)

論黃宗羲與清代浙東經史學派的學術成就及學派特色	吳 光 (423)
論馮登府的三家《詩》學	馬 昕 (448)
王昶《春融堂集》版本考	朱惠國 裴風順 (469)
張維屏事跡考	施志詠 (474)
《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版本敘錄	張 劍 (497)
四川通志考	張學君 (510)
從方志記錄看馬燈舞的關係性空間	王 皓 王小盾 (530)
成都尊經書院籌建經過與建制	魏紅翎 (544)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詞義誤釋與無釋之補證	魏耕原 (571)
從洛地先生問學散記	解玉峰 (583)

素王改制：廖季平先生經學思想的核心

清末民初的著名經學大師廖平（季平）先生，離開人們已是八十多年了，先生其人與其終生從事的經學這門學問也漸若存若亡地被學林淡忘將近百年。而在20世紀“文化大革命”結束，科學的春天來臨之後的80年代，乃漸有人出而研究先生的經學，雜誌上有人寫專題論文，也有先生著作的選本以及先生的評傳出版，看來先生尚未完全被淡出學林，也可說是一件幸事。但先生之學高深幼眇，其講論汪洋恣肆，學者多不能得其旨要，見仁見智，眾說紛紜，愚讀諸家書，亦多不能得其甚解，常期期以爲不可。頗願以愚陋之見陳奉諸君席右，苟能惠承高明大教，使先生之學得以重光於世，則何幸如之！

一、廖氏經學與傳統經學

世之論廖氏學者常喜以“六變”爲論點，六變乃先生所自定，固不可以不講，然六變多不可得其一貫之旨，又不易得其轉變之由，評說爲難。且先生之學雖有六變，六變之中有否不變者在，又常爲論者所弗及。故有關先生之評論幾於言人人殊。

早年有位著名的胡適博士，稱先生是方士（見廖宗澤《六譯先生行述》）^①，以不知其所據，不敢辯，更不敢論，只覺“方士”一詞似已將廖先生從學術界中除名，是不是有些霸道。而且，就算有點根據，顯然也是以點代面，極不公平。

近來有位劉小楓先生寫了篇《六譯聖人贊》，^②這似又把廖先生尊爲“聖人”，

① 載廖幼平編：《廖季平年譜》，巴蜀書社1985年版。

② 載《讀書》2000年第11期。

劉文的論說頗有可取之處，但文中常用外國哲學術語作論斷，愚不學，不敢辨其是非，因此也不便隨聲附和。

另有一種得到較多學人信從的是馮友蘭、范文瀾兩先生的說法，馮先生說：

——
——
廖平所說……吾人若以歷史或哲學視之，則可謂無價值之可言。但廖平之學，實為中國哲學史中經學時代之結束……其經學之為變，始於民國七年，其此後所講之經學，可謂已將其範圍擴大至於極點。其牽引比附，有許多可笑之處……就時間言，就其學之內容言，皆可以結經學時代之局者也。^①

范先生說：

他（指廖先生——引者注）的經學變了六次，第一變講“今、古”，第二變講“尊今抑古”，第三變講“小、大”，第四變講“天、人”，第五變講“人學”“天學”（應作“天人、大小”^②——引者注），他這五大變，愈變愈離奇，牽強附會，不知所云。他還想再變一下（第六變），雖然有十四年的時間，但終於沒有變出來，這證明了今文學的“末路”……“末路”的前面擺着是“死路”。^③

兩位大師的說法影響頗為廣泛，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表的幾篇論著基本上都是跟着這個調子在唱：“廖平經學六變，標誌着經學到此終結。”^④“四變以後……往往荒誕可笑，正說明經學到了終結，這條路行不通了。”^⑤“廖平的經學理論，有着自己的歷史義蘊，這就是無情地宣告了經學的終結。”^⑥直到2010年，都還有人唱着大致相同的調子：“他一生尊孔讀經的呼號，又恰恰成了古典經學最終退出歷史舞臺的哀鳴。”他是“中國古典經學的最後一位大師”^⑦。類似的說法當然還

①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三年蓉第一版，第1040～1041頁。

② 《五變記箋述》，載李耀先主編：《廖平選集》上冊，巴蜀書社1998年版，第558頁。下引《廖平選集》同此版本，不另注。

③ 《范文瀾歷史論文選集·中國經學史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96頁。

④ 陳德述、黃開國、蔡方鹿：《廖平學術思想研究》，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頁。

⑤ 鍾肇鵬：《廖平》，載賈順先、戴大祿主編：《四川思想家》，巴蜀書社1988年版，第542頁。

⑥ 黃開國：《廖平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297頁。

⑦ 舒大剛：《經學大師廖平評傳》，載《宜賓學院學報》2010年1月第10卷第1期。

有，這裏就不贅引了。

看來，認為傳統經學在清末民初已踏上行將終結的旅途，似乎是不少學人的共識。但是，這個行將走完它的旅途而終結的傳統經學，卻並不是廖氏所講論的經學，而是隨着清王朝的覆滅而即將終結的清代經學。蓋清代皇帝只顧自己統治的鞏固，並不期望儒者能有才幹以資世用，而盛世以下的儒者也只知搞點訓詁考據之類的無用之學、做點八股文，以求苟且偷安，故清儒經學之衰微頹敗也勢所必然。此近世之言清學者所盡知，梁啟超、錢賓四等大師也都有所論，用不着我們再來贅述。與此同時，學林中也湧出一些“先知先覺”之士，一些人受西學影響起而反對傳統經學，也有些是從傳統經學中決裂而出另闢一條新路。廖季平先生可以認為是後者中的一員。兩部《清經解》歷來被認為是清儒解經的集大成的著作，但在廖先生眼裏卻受鄙夷，他在《知聖篇》中說：

阮刻《學海堂經解》，多嘉、道以前書，篇目雖重，精華甚少。一字之說，盈篇屢牘；一句之義，眾說紛紜，蓋上半無經學，皆不急之考訂；下半亦非經學，皆《經籍纂詁》之子孫。^①

王刻江陰《續經解》，選擇不精，由於曲循情面與表章同鄉。前半所選，多阮刻不取之書，故精華甚少。後半道、咸諸書，頗稱精要。^②

但其被認為“頗稱精要”的陳卓人、陳左海之書，也被廖氏在他處評為“不識堂奧，依傍門戶，略知本原，未能瑩澈”。^③而廖氏對清代經學的總評則為：“國朝經學，初近乎空虛，繼近於骨董，終近於鈔胥。”^④而其自述則謂：“蹈沒其中（指兩《經解》，——筆者注）十數年，身受其困，備知其甘苦利害，以此皆不爭之辨，無用之學，故決然捨去，別求所以安身立命之術。”^⑤“腐儒不足以論國計、救危亡也。”^⑥顯然廖氏早就與清儒經學決裂而“別求安身立命之術”了，先生的第一變就是從清儒經學變出來。因此，廖先生的經學與清儒經學是迥然不同的，只需從兩家的學術內涵略作對比就不難看出來：

① 《廖平選集》上冊，第208頁。

② 《廖平選集》上冊，第210頁。

③ 《廖平選集》上冊，第400頁。

④ 《廖平選集》上冊，第401頁。

⑤ 《廖平選集》上冊，第209頁。

⑥ 見《致薊室主人書》，署黃溶、胡翼等公擬，一般認為實即先生自作，收入《家學樹坊》，《廖平選集》下冊，第624頁。

《知聖篇》說：“近賢論述，皆以小學爲治經入手，鄙說乃易以《王制》。通經致用，與政事爲近；綜大綱，略小節，不旬月而可通。推以讀經、讀史，迎刃而解。《勸學篇》言學西藝不如西政……讀《王制》，則爲學西政之義，政高於藝。”^① 所謂“綜大綱”即同篇所言“六經要旨，以制度爲大綱”。^② “制度則經營天下，裁成萬類，無所不包，如《王制》是也。制度最大最要”。^③ 亦即《經話》所言“經學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④ 自《王制》入手正爲研究制度作鋪墊。近世學者謂：“清人三百年之學，主於考據，尋名物，求訓詁，雖治經而無與於經。”^⑤ “其治經者，但能詳名物、通訓詁，亦得好爲經師。”^⑥ 是清人治經以名物、訓詁爲重，故自小學入手；與廖氏以經營天下、裁成萬類之制度爲六經之旨要相去遠矣。

《今古學考》言：“予治經以分今、古爲大綱，然雅不喜近人專就文字異同言之。”^⑦ 故先生教人最戒“以古亂今，不分家法”。^⑧ 然治經分今、古“是西漢經師舊法也”^⑨，且於“魏晉已絕”。^⑩ 而清人則於“今、古之分，或頗駭怪”。^⑪ 即以常州學派之宋于庭言，雖“大張今學之幟，然於今、古之界畔不能辨，於是以三世諸義濫及群經，視前世區區欲以文字辨今古者誠殊，而其不知根荄則一也”。^⑫ 其餘則或但知有今古名目，或竟不知今古之爲何事？是其與廖先生之治經相隔猶雲泥也。

廖先生言：“經學以素王爲主，受命改制乃群經大綱。”^⑬ 先生又言：“改制爲《春秋》大門，自來先師多不得其意。”^⑭ 而章太炎言：清世“理學之言……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經師則多“務觀世知化，不欲以經術致用”^⑮，是清儒治經與廖先生以改制救世爲宗旨大不侔也。

① 《廖平選集》上冊，第 208 頁。

② 《廖平選集》上冊，第 185 頁。

③ 《廖平選集》上冊，第 194 頁。

④ 《廖平選集》上冊，第 471 頁。

⑤ 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師與近代今文學》，《經學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9 頁。下引《經學抉原》同此版本，不另注。

⑥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與清代漢學》，《經學抉原》，第 104 頁。

⑦ 《廖平選集》上冊，第 89 頁。

⑧ 《廖平選集》上冊，第 399 頁。

⑨ 《廖平選集》上冊，第 76 頁。

⑩ 《廖平選集》上冊，第 89 頁。

⑪ 《廖平選集》上冊，第 73 頁。

⑫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經學抉原》，第 197 頁。

⑬ 見《公羊春秋補證凡例》，載《群經凡例》，尊經書局光緒三十二年刻。

⑭ 《廖平選集》上冊，第 500 頁。

⑮ 兩則皆見《檢論·清儒》，載《章太炎全集》第三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自上所述經學入門、經學之旨要、治經方法、學經宗旨的比較，可以看出清儒經學與廖氏之學相去有若天壤，說清學的由盛而衰、由興而頹，是早已由其內在理路所決定了的。清學的走向終結，顯然與廖氏不涉。因此，上揭諸家對廖學的評說雖仁、智各別，但皆顯然與廖學不切，我們不得不再來看別家的評說。

著名學者劉申叔（師培）先生曾評廖氏言：

明於《春秋》，善說禮制，洞徹漢師經例，魏晉以來未之有也。

劉先生對廖先生的評論，與上揭廖氏自道其經學三個大綱——六經旨要以制度為大綱、治經以分今古（含家法條例）為大綱、經學以素王改制為群經大綱——若合符節。蓋劉氏乃清末民初著名經古文學大師，又是四世傳《左氏》的經學世家，學術精淳，識見宏深，且嘗遊西蜀，與廖氏共講席於成都國學院，朝夕相處，議論相接，故能對廖學有高度認知、深刻理解，乃能作出如此中肯、準確、的當的評語，特其末“魏晉以來未之有也”的結論，就準確地點出廖氏經學與魏晉至清的傳統經學是迥不相同的。這就明白指出前揭諸君以廖學標誌着傳統經學的終結之為誤判則可不言而喻了。

但是，劉先生這個論斷雖準確指出廖學與清學之截然不同，惜乎他還沒能點出廖學的實質及其歷史意義，這就不得不請讀者再看看侯堯先生紀念廖氏逝世所作《廖季平先生評傳》一文：

先生在中國經學史上，具有相當地位，而在晚清思想史上，亦握有嚴重轉捩之革命力量。由先生而康南海，而梁新會、而崔觯甫，迄至今日如《疑古玄同》、馬幼漁、顧頡剛諸先生……均能擴大而為辨偽之新運動……回憶四十年來之中國思想界，類似霹靂一聲者為康南海之《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等等，而廖先生則此霹靂前之特異的電子……吾人於今日審查學術思想之進步，除東西舶來品外，要不能不歸功於貞下起元、曙光煥發之廖先生！……廖先生崛起，著成《今古學考》《古學考》《知聖篇》《四益經話》等書，遂將三千年來之孔子，及數千年之經學，與經學所產生之思想言論，根本改造，發前人所未

發……此一切一切皆形成空前之結論，又皆尊源於廖先生之經學革命之功。^①

侯先生這篇文章雖作於八十多年前，但並未因時光的流逝而失去其意義，侯文的意義就在於它如實地道出了廖氏經學的實質；廖先生是在傳統經學逐步走向衰頹消亡之際進行了一次經學的革命，創建了一個新的經學體系，這纔是廖學的準確的歷史定位。

二、“素王改制”是廖氏經學內在發展的必然結論

先生家庭並不是詩禮傳家的書香之家，而是生活比較困苦的平民之家。少年時奉命執役茶肆，偶不慎茶水誤污客衣，遽遭怒斥，先生深以為恥，辭肆事立志讀書，但先生記性欠佳，不能背誦，至十多歲時猶然，幾於輟學，塾師許以不背，乃得續讀。後思路漸進，乃習為時文，曾三赴院試，於同治十三年（1874）乃中秀才，時年二十三歲。次年，尊經書院成立，擇府縣高材生肄業其中。光緒二年（1876），先生赴成都應科試，以優等補廩餼，調讀尊經，時尊經由錢塘錢鐵江徐山主講，教以吳皖之學，始知訓詁、考據之藝。光緒四年（1878），學政譚宗浚集尊經諸生三年課藝刊為《蜀秀集》，先生入選者有《爾雅舍人小考》《六書說》《滎波既豬解》等九文。是年十二月，湘潭王闓運（湘綺）來川主講尊經。王善文詞，曾入曾國藩幕，撰《湘軍志》，亦治經學，為《公羊箋》聞於時。次年二月，闓運遷住內院，先生與張祥齡均有志於《公羊》，常與祥齡就教於王，每至深夜。先生之由吳學轉治今文，顯以湘綺之故。然王“故文人耳，經學所造甚淺，其所著《公羊箋》，尚不逮孔廣森”。^②先生既事湘綺有日，疑亦不嫌於王。吳虞《六譯老人餘論》載先生嘗言：“王湘潭於經學乃半路出家，所為《春秋例表》至於自己亦不能尋檢。世或謂湘潭為講今學，真冤枉也。”^③據《六譯先生年譜》，王著《春秋例表》在光緒六年（庚辰），先生自謂：“庚辰以後，厭棄破碎，專事求大義，以視考據諸書，則又以為糟粕而無精華、枝葉而非根本。”（《經學

① 本段文字轉引自鍾肇鵬《廖平評傳》，載鍾著《求是齋叢稿》下冊，巴蜀書社2001年版，第845頁。

② 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商務印書館民國三十三年渝第二版，第46頁。

③ 又名《愛智廬隨筆》，載《吳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頁。

初程》)^①《年譜》^②謂先生是年“專治《穀梁春秋》，纂《穀梁先師遺說考》四卷”。民國五年湘綺卒，尊經同人設奠於尊經舊址祭之，先生祭文有“避火畫水，投荒《穀梁》”^③之句，連串讀來，豈能無言外之意耶！

先生此所謂“求大義”主要是落實在六經制度上。其治《穀梁》首重制度，因以與《王制》相校，乃見“《王制》無一條不與《穀梁春秋》相同”，“然後以此為素王改制之書”，遂由此引出一段發現“今、古學”的緣由：

乙酉（光緒十一年）春，將《王制》分經傳寫鈔，欲作《義證》，時不過引《穀梁傳》文以相應證耳。偶鈔《〈異義〉今古學異同表》，初以為十四博士必相參雜，乃古與古同，今與今同，雖有不合，非其巨綱，然後恍然悟博士同為一家，古學又別為一家也。遍考諸書，歷歷不爽，始定今古異同之論。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為晚年說，弟子多主此義，推以遍說群經。漢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說。乃訂《王制》為今學之祖，立表說以明之。

同時，又發現“今古經傳，唯存《春秋》。《王制》《周禮》皆三傳所據以為今古之分者。四家為今古之正宗、同異之原始”。“今古禮制以《王制》《周禮》有明文者為正宗，以三傳有明文者為輔佐。”因而乃定“今古之分，全在禮制”。“今古之分，本以禮制為主。”“今古之分，不在異文。”^④乃於翌年成《今古學考》。書甫成，西平蕭藩稱先生之書“恢復今古舊學，雖原本漢人，然其直探根本、明晰條流規劃，乃在伏賈之間，西漢以來無此識力”。^⑤即以比於顧亭林之論古音、閻百詩之攻偽《尚書》，同為清代經學三絕。

今、古之事為兩千年之絕學。先生之前，學人蓋唯知文字異同或立學與否，皆未曉其根本，“先生依許、鄭《五經異義》以明今古之辨在禮制，而歸納於《王制》《周官》，以《王制》《穀梁》魯學為今學正宗，以《左氏》《周官》梁趙學為古學正宗，平分江河，若示諸掌，千載之惑，一旦冰解。皮氏（錫瑞）、康

① 廖平：《經學初程》，尊經書局光緒二十三年刻，第12頁。

② 此《年譜》指廖宗澤：《六譯先生年譜》，正由上海古籍書局出版中，我所據係清樣本，巴蜀書社所印係據此《譜》摘錄，下引《年譜》同此，不另注。

③ 見《年譜》引。

④ 此上八引皆見《今古學考》卷下。

⑤ 見蕭藩《公羊解詁三十論》跋語，尊經書局光緒二十三年刻。

氏（有爲）、章氏（炳麟）、劉氏（師培）胥循此軌以造說，雖宗今宗古之見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禮，則皆決於先生說也”。^① 故其書始出，德清俞蔭甫先生亟稱爲“不刊之書”。^② 俞氏弟子章炳麟先生亦言：“井研廖氏說經善分別今古，蓋惠（棟）、戴（震）、凌（曙）、劉（逢祿）所不能上。”“廖平之學，與余絕相反，然其分別今古文，確然不易。”^③ 世學之稱譽先生多以此。

然時人亦有持異義者。恕我淺陋，我近來纔讀到王俊義先生在世之初所寫《經學及晚清“經今、古文學分派說”之爭議》^④，得知李學勤先生有《清代學術的幾個問題》一文，“對經學史上的許多重大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獨到之見”。但很遺憾，我也沒能找到李先生的文章，只得引用王先生文中的轉述了：

關於漢代有經今、古文之說，主要是廖平在其《今古學考》中提出來的，而後康有爲在其著作進一步闡定……然而這樣的觀點實際是不可取的。所以有必要重新考慮漢代經學所謂今文爲一大派、古文爲一大派的觀點。

可惜王先生所引李文過於簡略，調子雖高，不知其詳，不便研討。據王先生說，他在錢賓四先生的《國學概論》與《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早曾提出與李先生相類似的觀點。經檢《平議》爲1958年合《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考》《孔子與〈春秋〉》《〈周官〉著作時代考》四文爲一書，所作《自序》中確有王先生所揭諸說：

此四文皆爲兩漢經學之今、古文問題而發。其實此問題僅起於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來掩脅學術界，幾乎不主揚則主墨，各持門戶，互爭是非，渺不得定論所在，而夾求之兩漢經學之實況，則無如此所云云也。

晚清經師，有主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主張今文經師之所說，既多不可信；而主張古文諸經師亦同樣不可信，且更見其疲軟而無力。此

①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經學抉原》，第197頁。

② 見《年譜》光緒十五年。

③ 兩引皆見《太炎文錄·程師》。

④ 承友人下載自“中華文史網”。

何故？蓋今文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學者門戶偏見，彼輩主張今文，遂爲今文諸經建立門戶，而排斥古文諸經於此門戶之外。而主張古文諸經者，亦即以今文學家之門戶爲門戶，而不過入主出奴之意見之相異而已。^①

賓四先生又常被稱爲實證派史學大師，其爲文多喜旁徵博引以爲說，而此處二論則僅論斷而無佐證，與先生所常論不類。及細讀先生之書，則驚見書中所論頗與序言所說刺謬不合。唯此今古之事固非三言兩語可了，故《家法考》一文略長四萬言，而今、古學實爲漢代經學中之最大家法，故文中之專言今古事者達數千言，於此不能詳引其論說，僅摘文中所作有關結論性意見如下：

東漢經學，仍無今文、古文之分，具如上說。然其時固有“今學”、“古學”之辨，此乃東漢經學界一大分野，亦不可不知也。東漢經師爲學，分野既別，風趣相異，而爭論亦時起，其最著者爲白虎觀議奏。史稱：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環，及（鄭）玄答何休，義據通深，於是古學遂明。

文字之古今，固無關宏旨也……知文之今古本不爲當時所重。當時辨學術分野則必曰：“古學”“今學”，不稱“古文”“今文”，大略率如是。

蓋諸經率皆有古字，即博士諸經亦然，故不得有今文經、古文經之別，經學之古今，皆不得指經籍與文字言。

漢人僅言“古學”，不言“古文學”，僅言“古文”，不言有“今文”，更無論有所謂“今文學”。

接上揭諸文，不難看出賓四先生是承認東漢經學中是確有“今學”、“古學”兩派，且先生用“分野”一詞言之，則似可與“大派”一詞等量齊觀；“今”、“古”雖可名學，“今文”、“古文”則只是不同文字，而無所謂“今文學”、“古文學”。

^① 上兩引自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以下所引皆見此書，不另注。

這與廖氏《今古學考》所言：“今古之分不在異文”^①，“但以文字論，今與今不同，古與古不同”。^②而廖先生之書亦但名“今古學”、“古學”，書中論說亦但稱“今”“古”（今學、古學省稱）、“今學”“古學”，從無“今文學”“古文學”名目，是錢、廖之說並無不同。至世俗所謂“今文學”、“古文學”，皆誤以今學、古學源出今文、古文之誤稱。但此誤稱沿用已久，也就似乎是約定俗成了；它的實義就是指的今學、古學，這是不用解釋的（當然也仍有對此模糊者）。

錢先生在書中不僅認為東漢經學有“今學”、“古學”的分野，而且明言“分野既別，而爭議亦時起”。《家法考》中且有《劉歆爭立古文諸經與東漢十四博士》《今學與古學》《白虎觀議奏與今古學爭議》諸節來專述其事。這與廖先生之言今古之爭也並無不同。惟廖先生在一變時誤以今、古學始於孔子親授（二變時已改），且於論說時或呵斥稍甚而已，殆皆源自漢儒以“俗儒”“鄙學”相訾之陋習耳。

《平議》諸文，據《自序》言：“彙刊各篇文字，均續有修訂。”是上引各節皆後定之文，宜可信據。且辭氣平和，用語亦有分寸，如對晚清學者之言，或稱“門戶之見”，或稱“門戶之偏見”，二辭含義當有不同，據先生之文，揣其意：“門戶”猶今言“學派”，此為古今中外論學術之不可避免者、學派不同則其對同一事物之認識、理解亦必不同（或不全同），認識、理解不同，則評價亦不同，此可謂為“門戶之見”，此亦古今中外學術界之不可避免者，這是正常的，也有其合理性。但是，我們絕不可因門戶的不同、見解的差異，更進而“蹈隙發覆、標新立異為表暴之資，而又雜以門戶意氣之私”^③，這就是“門戶之偏見”了，這就不能是正常的、合理的了。但這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能排除私心，一切門戶之偏見都是可以破棄的。因此，愚以為：“戶之偏見”不可有，“門戶之見”不能無；不可因門戶之見而滋生門戶偏見，也不可打着否定門戶偏見的旗號而全面否定門戶之見。我讀先生《自序》，私度其意，當謂：晚清經師，無論是主張今文的經師，抑或是主張古文的經師，其所說皆不可信，蓋其今古文之分，都沒能把握分判今古的正確方法，而出於學者們的門戶偏見。所說都不符合“兩漢經學之實況”，“同樣不可信”。人們應當“全據歷史記載，就於史學立場”，“以超出

① 《廖平選集》上冊，第90頁。

② 《經學四變記·初變記》，《廖平選集》上冊，第547頁。

③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

從來經學專家藩籬壁壘之外（排除偏見），而另闢途徑，別開戶牖”，“而重在發現古人學術之真相”。則漢代經學中“今學”“古學”的分野、時相爭論的事實，也就可以“顯真是”了。“而後僞說可以息，浮辯可以止。”^①我認為這樣纔是對賓四先生《自序》本意的全面理解。假如斬頭去尾、東拼西湊地歸納錢文之意為“兩漢經學本無今古兩派之爭的事實”，我認為這是對錢文的誤讀和曲解，可能對不知情的讀者產生誤導，有必要據錢書的考論附辨於此。

廖先生據禮制以判今、古之義既立，但今、古兩派對同一事件所言禮制何以會有許多（甚至很大）不同呢？《今古學考》對此有這樣的解說：

周制到晚末，積弊最多。孔子以繼周當改，故寓其事於《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選舉之政；因閹弑吳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門；因諸侯爭戰，乃使二伯統制之；國大易為亂，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瀆祀，乃訂為四時禘祭；厚葬之致禍，乃專主薄葬。凡其所改，專為救弊，此今學所以異古之由。^②

很清楚，孔子認為周制晚年弊多，針對當時的制度的弊端，孔子提出了改革的意見，這就是“救弊補偏”、“繼周當改”，這就是“今學所以異古之由”。這就是一般所說的“改制”。但是，問題又出來了，“改制”既是孔子所提出，為什麼一部分弟子跟隨着主張改制，而另部分弟子卻又仍主張保留舊制要“從周”、“法古”呢？《今古學考》對此又有這樣的解釋：

孔子初年問禮，有“從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於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補偏；於是以心所欲為者，書之《王制》，寓之《春秋》……所謂因革繼周之事也。後來傳經弟子因為孔子手訂之文，專學此派，同祖《王制》。其實孔子一人之言，前後不同。予謂從周為孔子少壯之學，因革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③

魯為今學正宗，燕趙為古學正宗，其支流分派雖小有不同，然大旨

① 所引五句亦見《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自序》。

② 《廖平選集》上冊，第78頁。

③ 《廖平選集》上冊，第68～69頁。

一也。魯乃孔子鄉國，弟子多孔子晚年說，學者以爲定論，故篤信遵守。初本以解《春秋》，習久不察，各是所長，遂以偏說群經。此魯之今學爲孔子同鄉宗晚年說以爲宗派者也。燕趙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辭而先反，惟聞孔子從周之言；以後改制之說未經面領，因與前說相反，遂疑魯弟子僞爲此言依託孔子。故篤守前說，與魯學爲難。一時隱君子習聞周家故事，亦相與佐證，不信今學而攻駁之，乃有《周禮》《左傳》《毛詩》之作。自爲朋黨，樹立異幟，以求合於孔子初年之說，此古學爲遠於孔子兼採時制，流爲別派者也。^①

這便是廖先生對古學主從周、法古，今學主因革、改制來源的解說，看來也還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從這裏，我們同時知道，“改制”之說起初是用以講論《春秋》，是爲了“改時制”，後來纔發展爲“偏說群經”“一王大法”。^②先生同時在《公羊春秋補證凡例》中還提出：

經學以素王爲主，受命改制乃群經大綱，非《公羊》一家之言，惟《公羊》盛行於漢，故其說獨詳耳。今以此爲微言。^③

此處明確提出了“素王改制”在經學中的綱領性地位，這個綱領性提法不僅見於此《凡例》，同時也見於《今古學考》和《知聖篇》。《今古學考》的《今古學宗旨不同表》明白寫着：

今主因革，參用四代禮。古主從周，專用周禮。^④

此所用“因革”是“改制”的同義詞，在同書卷下中多寫作“改制”。而“從周”在他處也或寫爲“法古”。在《經學初變記》中就明確寫爲：

“今”、“古”兩家所根據又多同出於孔子，於是倡爲“法古”、“改

① 《廖平選集》上冊，第73頁。

② 《廖平選集》上冊，第106頁。

③ 廖平：《公羊春秋補證凡例》，載《群經凡例》，尊經書局光緒三十二年刻。

④ 《廖平選集》上冊，第44頁。

制”，初年、晚年之說。^①

這說明廖氏經學在第一變時不僅倡言古代經學有今古兩派之分，而且還指出兩派講論經學宗旨也有今主改制、古主從周的不同。同表又載：“今爲經學派，古爲史學派。”同書卷下載“經話”一百一十條，其中談及改制的就有三十條之多，還特別指出：“今學則全祖孔子改制之意。”這都表明“改制”一義在廖學一變中已佔有突出的地位。“挽弊補偏”，“改周救文”，“改制救弊”，“改周文”等等文句在卷中不一而足。廖先生在卷中不僅聯係周代歷史談改制，而且還聯係晚清的現實：

《春秋》去文從質、因時救弊意，本於老子……春秋時有志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張也。^②

先生致力於經學研究之時，正是東西列強對我虎食鯨吞之際，攫我屬國，割我領土，侵我主權，甚至更明目張膽地叫囂“瓜分中國”。亡國滅種、宗社成墟之危有如累卵，有志之士莫不思變圖強。先生生當斯時，豈能無動於衷！先生之所以高倡“改制”一義，無疑是受到《春秋》的啟迪，而更重要的是受到時代的激勵。從而他把改制提爲“群經大綱”、“群經統宗”，更且張大其辭地提爲“素王改制”、“孔子改制”，顯然就是要提升“改制”的意義，加重“改制”的分量，以引起廣大士人的覺醒（“啟士智”），而不僅僅是爲了講《春秋》，也不僅僅是爲了講群經，也不僅僅是爲了“尊孔尊經”，結合先生對清儒批評之嚴厲：“語之政治經濟，仍屬茫然”^③，“腐儒不足以論國計、救危亡也”。^④他倡言改制是有着保國保種保教的深意的，是包含着強烈的時代意識的，是貫穿着高度愛國主義精神的。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先生自庚辰以“專事求大義”讀經以來，他的進路首先是：“六經要旨，以制度爲大綱”^⑤又進而由講論禮制（制度）的差異，發現

① 《經學四變記·初變記》，《廖平選集》上冊，第548頁。

② 《廖平選集》上冊，第85頁。

③ 《廖平選集》上冊，第208頁。

④ 見《致蒞室主人書》，《廖平選集》下冊，第624頁。

⑤ 《廖平選集》上冊，第185頁。